

· 专题研究 ·

# 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sup>\*</sup>

## ——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的再讨论（之二）

沈 志 华

**摘要** 1949年2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斯大林了解到中共的意向，双方明确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性；7至8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毛泽东知道了苏共的态度，双方进一步明确了各项方针政策的一致性。至此，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已经确立，毛泽东不再考虑与美国接触，公开宣布向苏联“一边倒”。

**关键词** 米高扬访华；刘少奇访苏；中苏关系；一边倒；司徒雷登

**中图分类号** D232；D8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815(2009)-04-0014-20

**From Xibaipo to Moscow: Mao Zedong's Announcement of "Leaning to One Side"**

**—— Re-discussions on the Background and Basis of Sino-Soviet Alliance**

Shen Zhihua

**Abstract:** Anastas Ivanovich Mikoyan paid a visit to Xibaipo in February 1949. Through this visit Stalin got to know the intention of the CPC and the two sides reached unanimity in ideology. Liu Shaoqi visited Moscow in July and August the same year; with this visit Mao Zedong was able to know the attitude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and both sides realized their consistency in general and specific policies. By now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had been laid and Mao Zedong, no longer willing to have any contac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penly announced the CPC's policy of "leaning to one side" —— the Soviet Union.

从1947年夏天到1949年初，经过一年半往来函电的沟通和试探，中苏两党领导人的直接会面终于实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托秘密访问西柏坡，这是苏共领导人第一次踏上中国的领土，也是莫斯科迈出的与未来新中国缔结同盟的第一步。4个月后，刘少奇、高岗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名义上是东北人民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苏联，也是自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和共产国际解散后，到苏联访问的第一批中共高层领导人，而这次访问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毛泽东公开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建国方针。

关于这两次中苏两党领导人互访的情况，十几年前俄国披露了一些文献，但不够系统，而中方的史料只有当事人的回忆录。2005年以来，俄国和中国都大量公布或开放了相关的档案

\* 本研究得到上海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B406）。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冷战与中苏同盟研究”（05BSS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见沈志华《求之不易的会面：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试探与沟通——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的再讨论（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关于米高扬访华见

（ ），1995，2，96~111，3，94-105。关于刘少奇访苏见

（ ），1996，4，66~83，5，84~94。中方的史料主要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文献。尽管从中可以看出还有一些核心文献尚未解密，但总体来说，研究者根据这些史料可以对中苏领导人最初接触的过程和内容进行基本分析，特别是由此可以解开以往一些令人误解或不解的谜团。

## 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积极成果

米高扬（化名安德列耶夫）于 1949 年 1 月 26 日从莫斯科出发，30 日到达西柏坡，同行的有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和一名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科瓦廖夫。根据目前公布的俄国档案文件，到 2 月 8 日离开中国，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共进行了 12 次正式会谈，即 1 月 30 日、1 月 31 日、2 月 3 日、2 月 4 日、2 月 5 日（两次）和 2 月 6 日同毛泽东的会谈（刘、周、任、朱列席），2 月 1 日（两次）同周恩来和朱德的会谈，2 月 2 日同任弼时和朱德的会谈，2 月 3 日同刘少奇和朱德的会谈，2 月 7 日与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未参加）的集体会谈。在这些会谈中，中共领导人详细而全面地介绍了中共的历史和中国的现状，以及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中共正在或即将实行的方针和政策。米高扬主要是听汇报，偶尔回答一些问题或插话，有时也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表明苏共在某些问题上的主张和立场。斯大林非常重视这次访问，米高扬在西柏坡期间，苏共中央政治局每天都开会研究和讨论米高扬的电报。会谈结束后，斯大林要求米高扬尽快返回莫斯科，详细汇报与中方会谈的各种情况。需要指出的是，1995 年人们看到的米高扬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是在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的时候提交的，其中难免有片面和责难的倾向，研究者在利用这一文件时大多也过于关注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其实，仔细阅读这 12 份备忘录及以后几个月的大量往来电报就会发现，西柏坡会谈的主要成果是积极的，即使有一些意见分歧，或者当时没有充分表露出来，或者中共立即就表示赞同莫斯科的看法，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

给人最明显的感觉是，中共领导人在谈话中反复和明确地表现出亲苏的立场。毛泽东在 2 月 3 日和 4 日谈到中共的历史时，一再高度评价苏共对中共的领导、指导和帮助。他说：“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十月革命直接影响和联共

（布）的帮助下于 1921 年成立的”，“1924 年前，列宁领导的苏联帮助我们，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也给了我们帮助。在这一阶段斯大林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1927 年 8 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才摆脱了机会主义的领导”。毛泽东还两次谈到 1937 年 7 月王稼祥从共产国际带回的纲领性指示完全适合中国的情况，帮助中共纠正了错误。关于苏共在思想观念上对中共的帮助，毛泽东特别列举了 1946 年 2 月斯大林关于军事历史问题的一封信，这封信指出，撤退也是一种斗争的合理形式。至于在中国内战时期，毛泽东指出，“从 1947 年起林彪经常向莫斯科要求这样或那样的援助”，“你们对满洲的军事援助占苏联对外援助的 1/4，这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 - XX  
V,  
1946 - 1950,  
2: 1949 - 1950 , :

, 2005;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在 2004 年开放的中国外交部档案中，也有几件与此相关的重要文件。

（ - 1949.） //  
, 1995, 2, . 104.  
1949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7 日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备忘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39, . 1, . 39, . 1 - 95, -  
, c. 33 ~ 93。以下所引西柏坡会谈内容均出自这些文件，不再一一注出。  
米高扬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60 年 9 月 22 日），. 3, . 65, . 606, . 1 - 17 //

, 1995, 2, . 109。遗憾的是俄国没有公布来自莫斯科的指示电，不过可以认为，米高扬讲话都是斯大林授意或同意的内容。米高扬报告列举的主要是他认为有问题的谈话内容，见, 1995, 2, . 105 ~ 107。学者对此的反应参见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41 ~ 43; .

: , 2000, . 73 ~ 74; 迪特·海因茨希著，张文武等译：《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 年，第 269 页。  
斯大林给拉辛的信（1946 年 2 月 23 日），《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 年，第 455 ~ 461 页。

“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未必能取得今天的胜利”。鉴于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指责斯大林在历史上对中国革命犯下诸多错误，他的上述表白是否反映了内心的真实感受，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明显，毛泽东当时要让莫斯科明白，中共对苏共和斯大林本人是心存“感激之情”的。

同时，中共领导人反复强调要向苏共学习，并决心与苏共站在一起。毛泽东首先声明：“我们大大落后于俄国，我们是幼稚的共产党人”，并几次坚持说自己是斯大林的学生。在谈到党的队伍建设、理论学习、工业管理、城市工作、青年和妇女工作、民族问题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一再说到了苏联经验的重要性，表明了虚心学习的态度。在谈到南斯拉夫的问题时，毛泽东称铁托就是中国的张国焘，是叛徒；在谈到两党之间的联系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请苏共“在中共中央设立代表机构”，周恩来则表示“真希望苏联离中国共产党的距离近些”，因为“主要问题要在莫斯科解决”。毛泽东还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中国应该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一边”，“对我们来说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尽管认识到中国的国情与苏联不同，中国的发展还处于非常落后的阶段，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要谨慎，还不能马上搞集体农庄等，但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反复强调：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五种经济成分中，“我们主张加强国家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成分”，而按其性质来说国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合作经济是半社会主义的。“我们的目的是用加强经济中的计划成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尽管米高扬多次表示不同意中共那些过于谦虚的说法，并认为中国的革命具有历史意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但对于中共反复表明亲苏立场，斯大林显然是感到满意的。下面一个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在2月3日谈到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合行动时，毛泽东建议在中国局势稳定后，应该尽快成立像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那样的共产党亚洲国家局（

）。对此，米高扬当即提出，按照苏共中央的意见，中共不应参加现在的共产党

情报局，而应建立以中共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

）。最初可以由三个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组成，以后逐步吸收其他政党。毛泽东随后问到，是否可以就成立情报局的问题与日本和朝鲜共产党进行联系，米高扬当场表示同意。显然，斯大林此时已经考虑到要让中共成为亚洲革命的领导者。

除了对苏共表示感激、亲近和友好外，在涉及与苏联的关系问题时，中共领导人谈得最多的就是要求莫斯科给予援助。为此，他们讲述了中共所面临的困难。这些困难主要不是来自军事方面——毛泽东称，中国革命的军事阶段实际上已经结束，打败蒋介石只用缴获的武器就够了——而在于中共完全没有管理城市和发展经济的经验。刘少奇谈到了这样的情况：进入大城市的初期，中共按照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把资本家的企业分给了工人，结果工人们把企业全部拆光卖掉了；有的地方强迫企业主提高工人的工资，以致他们无法经营，不得不关闭店门，结果反而造成大量工人失业。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共十分缺乏懂得城市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干部，为此，甚至不得不推迟对上海、南京、西安等大城市的进攻和占领。刘少奇和任弼时也多次谈到，中共不知道应该如何制止通货膨胀，如何对待外国企业，如何在盐业、烟草和酒类方面实行国家垄断，也不知道如何对四大家族和大买办的资产实行国有化，如何对外贸实行垄断。这给米高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写到：中共领导人对一般政治问题、党务问题、国际问题、农民问题和经济问题，都“非常内行，很有自信”，但是对经营管理问题却“知之不多”，“对工业、运输业和银行的概念模糊”，对中国的企业和经济状况不了解，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总之，“他们处在闭塞的农村，脱离现实”。

正因为如此，会谈中，中共领导人特别强调在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方面需要苏联给予大

从这里可以看出，米高扬在1960年报告中所说，中共“对党组织中的无产阶级成分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他们“避免夺取大城市而努力占领农村，如不想夺取上海”云云（1995，2，105），完全误解（或有意歪曲）了毛泽东的原意。

力帮助。在这方面，除了希望苏联提供保卫大城市的高射炮，发展经济的贷款（3亿美元），制止通货膨胀的白银、纸张和油墨，以及其他物资援助外，主要就是需要苏联派来大批的顾问和专家。在2月1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强调：“我们想请求苏联给我们派来一些专家和提供制造武器的设备，并派遣一些顾问帮助我们训练部队、建立军事院校和组织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后勤工作。”2月2日的会谈专门讨论了在发展工业方面中苏合作的问题。任弼时指出，在国民经济计划中，中共将把东北放到显著地位，力争把它变成国防基地。在东北工业开发上，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援助的方式可以是建立苏中联合企业、苏联提供贷款和向苏联提供租让企业。任弼时强调，东北工业开发需要高级技术专家，而在鞍山的冶金企业中现在不得不利用日本专家。因此，“我们请求苏联派遣不少于500名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专家到中国来”。在2月3日的会谈中，刘少奇说：“如果没有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在解放后的中国建立工业基础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帮助我们将起决定性作用。我们考虑，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形式：1. 提供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经验。2. 向我们提供相应的文献资料，为我们派来各种经济顾问和技术人员。3. 为我们提供资金。”“有了苏联的帮助，我们将更快地走向社会主义。”“我们想尽早知道苏联方面究竟能给予我们多大规模的援助，以便我们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考虑这个问题。”毛泽东则在2月4日提出：“中国共产党需要联共（布）提供全面的援助。需要两方面的顾问，即经济方面和财政方面的顾问。”对于中共提出的要求和建议，米高扬在原则上表示同意。

会谈时另一个比较集中的话题是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在这方面，中共领导人的谈话比较谨慎。周恩来在2月1日的会谈中介绍了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历史。周恩来说：中共与外界的联系是从1944年美军观察团到延安开始的，那时中共坚持了“禁止美国干涉我国内政的政策”。同样，马歇尔使华时中共也拒绝参加中美调停委员会。此后就中断了与美国的关系，即使与中间人有一些接触，也仅限于了解情况。接着，周恩来谈到战后中共与美国的六次冲突，并总结说：“我们不会挑起事端，但如果美国反

对我们，我们将给予坚决的回击”。周恩来没有全面地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显然是担心引起斯大林的怀疑和不满。谈到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关系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介绍了中共的一些基本方针或做法，如原则上主张没收外国的企业，尽管执行时会灵活一些；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使用电台；停止或限制外国通讯社、出版社和报刊在中国的活动；对美国在解放区的领事馆采取排挤的方法，让他们自己感到困难而主动撤离，对其工作人员则视为侨民；切断美国在华军事基地与外界的联系，逼迫他们撤离，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显然是考虑到苏联在东北的特殊利益，周恩来特别提到要把外国势力赶出东北，“在满洲和外国之间筑起一道铁壁铜墙”。至于苏联在中国的报刊，中共建议在名义上委托中国的民主人士办理，而苏联的领事机构也可以在实际继续自己的活动。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提出了未来新中国政府与外国建交的问题，鉴于有消息说美英可能会承认中共政权，中共领导人考虑了两种方案，或者争取各国立即承认（希望苏联首先承认），或者不急于与各国建交，拖上一年半载。中共倾向第二个方案，并希望苏共对此提出建议。至于贸易问题，中共将首先与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做生意，只有多余的产品才卖给西方国家。对这些问题，米高扬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只是说到没收国外企业时，两次提出对日本、英国和法国的资产应该实行国有化，但对美国的财产“应当采取谨慎的政策”，在中国局势稳定以后，“根据形势和美国的態度再作决定”。或许，斯大林此时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考虑成熟，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即不能刺激美国。

会谈也涉及了中苏两国关系中一些长期存在的敏感问题，主要是外蒙古、新疆和东北问题。不过，双方对这些问题都只是试探性地表示了看法，而无意进行深入地讨论。

在2月4日的会谈中，当米高扬指出苏联主张在中国实行民族自治而不是民族独立的政策时，毛泽东显得很高兴，随即提出了外蒙古的问题。虽然米高扬已经表明苏联不支持外蒙古和内蒙古联合的建议，毛泽东仍坚持说，两年以后，当中共政权得到巩固时，外蒙古便可以与内蒙古合并，回到中国了。米高扬反驳说，外蒙古早已独立，而且得到了中国政府和苏联

政府的承认。即使有朝一日外蒙古与内蒙古合并，也只能是一个独立的蒙古。这时，任弼时提醒说：内蒙古有 300 万人，而外蒙古只有 100 万人。不过，毛泽东表示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外蒙古独立对苏联的确是一个非常有刺激性的问题。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把外蒙古的独立地位固定下来，使其成为保障苏联安全的缓冲地带。所以，尽管毛泽东已经表示收回自己的意见，在 2 月 6 日的会谈中，米高扬仍然传达了斯大林的意见：外蒙古领导人热心于把整个蒙古联合起来，但苏联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其结果是中国将失去大片领土。斯大林在这里说的不完全是实话。外蒙古宣布独立后，1946 年 2 月，在讨论苏蒙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时，蒙古领导人乔巴山确实向斯大林表示了要把内蒙古和兴安岭地区并入蒙古共和国的想法，斯大林担心这样做会引发与中国的战争，但答应乔巴山“可以悄悄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现在，斯大林当然不会再考虑把内蒙古合并到外蒙古的问题，但是要让外蒙古回到中国，也是万万行不通的。

新疆问题也是在 2 月 4 日会谈中毛泽东主动提出的，但这一次未等毛泽东把话题展开，米高扬就抢先说：新疆伊犁发生的独立运动是中国政府采取的错误政策引发的。但是，“如果让新疆少数民族享有自治权，那可能会留下独立运动的土壤”。苏联“不想造成新疆的独立，也不觊觎新疆的领土”，我们认为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苏联只是要与新疆进行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这时，毛泽东插话说：白崇禧告诉他，伊犁暴动者使用的是苏式武器。米高扬立即说：对此事不清楚，但苏联没有支援过新疆的独立运动。随后，毛泽东谈了三层意思：中共准备给予新疆像内蒙古一样“完全的自治权”；对新疆丰富的资源特别是石油很感兴趣；建议在新疆修建铁路把中苏连接起来，这具有战略意义。最后，在 2 月 6 日谈话时毛泽东说：按计划“我们将在 1951 年进驻新疆”。毛泽东在这里又提出了一个对于苏联来说非常敏感的问题，而米高扬迫不及待的解释和辩白给人的感觉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苏联对新疆的确是非常关注的，远的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在华的 12 个驻外机构中有 8 个都在新疆，可见这一地区在莫斯科心目中的地位。1944 年 11

月爆发的伊犁事件，确实也与苏联背后的大力支持有密切关系——苏联不仅为起事者训练军队，而且提供了武器和军事顾问。不过，此后苏联又改变了政策，这主要是担心自己的边疆地区同样会受这股分裂势力的伤害。1945 年，为使中苏条约尽快签字，斯大林许诺帮助平息新疆事件——他确实也做到了。无论如何，毛泽东的几句话对中共提前解决新疆问题还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接下来谈到东北问题时，双方就没有那样直接了。在谈到废除蒋介石的卖国条约时，毛泽东说：他曾向民主党派领导人解释，有些具有爱国性质的条约不能废除，如关于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苏中条约。米高扬要求说明这种说法的根据，毛进一步解释说：“苏联不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势力，而是作为社会主义力量来到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目的是保卫共同的利益”。接到斯大林的电报指示后，在 2 月 6 日的会谈中，米高扬指出，苏联认为“关于旅顺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苏联政府决定废除这个条约”，等对日和约签订以后，苏联将从旅顺撤出军队。如果中共认为需要立即撤军，苏联也准备这样做。但是，米高扬接着指出，中长铁路主要是靠俄国的资金建成的，所以这个条约

斯大林与乔巴山会谈记录（1946 年 2 月 22 日），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  
. 17, . 116, . 262, . 1 - 4。  
乔巴山的继任者泽登巴尔曾告诉索尔兹伯里，“毛泽东掌握政权后首先采取的行动就是要求斯大林归还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斯大林拒绝了这个要求，并加强了对这个与中国有 1500 英里边界线的战略地区的控制”。Harrison E. Salisbury, “Image and Reality in Indo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49, 3, April 1971, pp. 387 ~ 388。  
，1945—  
1956 . // ，2002, 2, c 116。  
参见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  
1937—1946 //  
，2000, 1, . 84 ~ 95。  
在刘少奇到达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就建议毛泽东应“对新疆予以认真注意”，还说“占领新疆事不宜迟”。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1949 年 6 月 18 日），  
. 45, . 1, . 331, . 119, -  
，c 148。

不是不平等条约。其中可能没有完全体现平等的原则，苏联准备就此问题与中国同志一起讨论解决。对此，中共领导人表示，苏军立即撤离旅顺港，认为这样会“给美国提供可乘之机”，这个问题应该留待中国“可以管理自己”的时候再去研究。不过，毛泽东提出，“在确定中长铁路的财产归属问题上还有些小问题”，这可以让高岗和科瓦廖夫去研究，然后向中共和苏共报告。后来事情的发展表明，在这里，中苏双方都没有完全讲出心里话，也可能中共领导人当时还没有完全了解东北问题的复杂性。

总体说来，米高扬的访问促进了中苏两党领导人的相互了解和理解，并大大推进了苏联与中共政权关系的发展。

米高扬走后，毛泽东更加明确了中共必须向苏联靠拢的方针，并且多次在党内指出这一点。2月16日，中共中央指示华北局和东北局：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是优先考虑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需要，“只有苏联及新民主国家不需要及不能供给的货物，我们才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或进口”。2月26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北方局、天津和北平市委，为增加对苏联的出口，当地政府要特别注意棉花、大豆、煤、盐、花生、烟草、丝绸、猪鬃、毛皮和手工艺品的生产。为了让全党重视与苏联的关系，3月13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没有国际援助，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看到“中苏关系今后会更加发展”，5月7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为了以后关系更密切，工作更合拍，误会更少”，需要对过去三年以来的中苏关系进行认真总结，并编成书面材料于5月底派专人送到中央。毛泽东本人则进一步向斯大林表示了敬佩之意和感激之情，他在5月12日会见科瓦廖夫时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应该归功于国际革命运动，首先是苏联”，“归功于我们的老大哥联共（布），归功于联共（布）的缔造者列宁和斯大林”。

档案文献显示，从1949年2月起，中共与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对

于会谈中提到的问题，双方进一步交换意见或作出答复。笔者还注意到，中苏两党之间联系的方式在此时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只有捷列宾作为联络员转交来往电报，而现在科瓦廖夫则作为苏共中央的代表，直接与中共领导人讨论各项工作，这无疑更促进和便利了双方的沟通、理解。

为了配合中共在西柏坡会谈中提出的有关对外政策的一系列措施，2月16日斯大林电告毛泽东：“鉴于我们与中国解放区的民主政权机构没有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鉴于解放区民主政权机关要求所有外国领事馆在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领事关系之前停止活动”，苏联政府已指示其在中国各地的领事：“在中国解放区停止一切正式的领事活动”；与当地民主政权机构保持“非正式关系的联系”，且必须在中方提出请求之后；在中国各解放区的苏联刊物交由经过领事挑选的中国公民办理，并应妥善办理登记手续，但实际的出版工作仍由苏联公民负责；塔斯社和苏联新闻局应停止向中国解放区的出版社、报刊和广播电台发送信息和文章，来自莫斯科的苏联消息均要转交给当地民主政权的相关机构，并由他们分送给中国的报社、出版社和广播电台；在中国解放区的苏联新闻记者应该停止自己的日常活动，而只能根据莫斯科与民主政权达成的非正式协议写一些文章和通讯报道。

中共进一步向莫斯科通报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并征询苏共的意见。3月12日，陈云向科瓦廖夫询问，中国能否与香港资本家进行贸易，以出口5万吨粮食换取必需的商品。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36～137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560～563页。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2页。

中共中央致高岗、李富春电（1949年5月7日）。凡未注明出处的档案，均为笔者个人收藏的民间史料。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5月17日），  
，. 45，. 1，. 331，. 50 - 51，  
，c. 128～132。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1949年2月16日），  
，. 45，. 1，. 330，. 129 - 130，  
，c. 99。2月26日，西方记者称，苏联驻北平的总领馆停止了自已的活动。媒体注意到，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没有参加预定的外国领事会议。  
，c. 541。

陈云补充说：向香港出售粮食不会减少协议规定的给苏联的粮食供应量，而在香港采购的都是苏联不供应的商品。科瓦廖夫在报告中表示对此持反对意见。4月13日，科瓦廖夫又报告，毛泽东告知，最近美国政府想通过花旗银行给中共政权贷款1至3亿美元，还有10个美国商业公司发来电报，希望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对此，中共均不予理睬。毛泽东还说：从和平谈判的进程看，国民党可能向共产党移交中央政权，因而中共中央认为应该改变过去一贯采用的与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观点，即在中共掌握了中央政权之后，“在个别情况下与他们进行实际联系，但法律上不履行外交关系手续”。毛泽东声明，这还不是最后的决定。

在4月19日和26日电报中，斯大林以十分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回答了上述问题：“我们认为，中国民主政府不必拒绝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建立正式的关系，只要这些国家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正式停止援助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斯大林强调，“这个条件非常重要”。此外，只要贷款和贸易的条件不会限制中国的主权和损害中国的民族工业，苏共中央认为“不宜拒绝外国贷款及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活动”。至于同香港的贸易，斯大林请科瓦廖夫转告陈云，苏共“希望中共不要排斥民族资产阶级”，而应“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内外的贸易活动”。不过，买卖什么货物应该由中共来决定。鉴于科瓦廖夫在19日的电报中说，中共领导人对渡江和南下作战持过于乐观的态度，斯大林在另一封长电中提醒中共，要警惕帝国主义采取从经济封锁到武力干涉的任何措施，特别是英美军队在后方登陆的危险性明显增加。因此，斯大林提出了三项建议：（1）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匆忙南下及进军边境地区，而要做认真准备。（2）从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中抽出两支精锐部队，调往各口岸，补充那里的军队，以防备敌军的行动。（3）目前不要裁减中国人民解放军。

此后，毛泽东还向科瓦廖夫通报了5月初中共代表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说：司徒雷登表示，美国人现在已经不再支持国民党政权了，以他为首的美国大使馆仍留在南京就是证明。关于在华的美国军队，只要人民解放军部队进入了青岛、上海，

美国就将撤走陆军和海军。不过，为了保护美国人在上海的2亿美元财产，美国政府考虑要在上海保留一些军舰和部队。谈到未来的联合政府，司徒雷登希望尽量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的代表参加。司徒雷登说：联合政府成立并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后，会有许多国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对科瓦廖夫说：他不相信司徒雷登的话，至于美国等国家的大使没有离开南京，“我们对此不感兴趣，如果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都滚出中国，我们才高兴呐”。

通过不断地交流和沟通，到5月下旬至6月中旬，中苏之间已经在许多问题上形成了一致看法，如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经济领导核心和机制，加强海关和边防军建设，暂不削减军队人数，建立沿海防御阵地以防敌人在后方登陆，与苏联建交前不大规模宣传苏中友谊，加快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步伐，暂不成立东方共产党情报局，南下的部队不越出国境并暂不要求收回香港和九龙等等。

西柏坡会谈后，苏联加快了向中共提供援助的步伐和力度。2月6日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决议，责成有关部门在10天之内将中长铁路所需要的汽车、汽车配件和器材以贷款供货的方式发送到中国；责成财政部从1949年度苏联部长会议准备金中给交通部拨付在东北的苏联工程技术人员所需经费578万卢布，其中412.5万卢布用于购买装备。同时，允许对外贸易部和

---

科瓦廖夫致莫洛托夫电（1949年3月13日），  
，. 45，. 1，. 331，. 1 - 2，  
，c 104。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4月13日），  
，. 45，. 1，. 331，. 15 - 21，  
，. 116 ~ 119。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1949年4月19日、26日），  
，. 45，. 1，. 331，. 24 - 25、3，  
，c 120 ~ 121、126。

，  
，1991，6，86 - 87。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1949年5月23日），  
，. 45，. 1，. 331，. 66 - 69，  
，c 132 ~ 134。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1949年5月17日、23日），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1949年5月26日），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1949年6月14日），  
，. 45，  
，. 1，. 331，. 50 - 51、66 - 69、73 - 75、101 - 111，  
，c 128 ~ 132、132 ~ 134、136 ~ 138、141 ~ 147。

国家银行再提供经费 240.1 万卢布；责成对外贸易部与中国东兴公司签订关于以商品供货方式清偿外汇支出和苏联外汇支出的协议；保留科瓦廖夫领导的满洲工作组全体人员出差期间在国内的职务及相关权利和待遇；允许科瓦廖夫根据在满洲完成的工作量确定固定的外汇工资标准，此工资标准也适用于其他在远东地区工作的专家；简化科瓦廖夫工作组人员出入境手续，只需凭科瓦廖夫签字即可；责成远东军区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给予科瓦廖夫工作组提供通信工具、翻译、司机及医务人员和医疗器材；责成科瓦廖夫在一个月之内提出中国各生产领域和国民经济规划方面所需要的参考书和技术文献，以保证工作组专家、顾问的业务工作。

5 月 31 日苏联部长会议还作出一项决议，决定租用 5 艘外国货轮（总载重 5.5 万吨）从黑海为中国北方地区运送石油产品。6 月 16 日又通过了帮助中国清除长江口的水雷的决议。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有研究者认为在此期间斯大林似乎有意拖延给中国的贷款。斯大林确实提出政府之间的贷款需要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办理正式手续，但又指出这个手续也可以通过科瓦廖夫代办，而不必非要中共派正式代表团来苏联办理。事实上，苏联政府确实采取了一些变通办法，为中共提供急需的贷款。如 1949 年 3 月为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解放区赴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提供 100 万卢布贷款（其 30 万卢布以法国法郎支付）；5 月 14 日同意为出国工作的新华社记者拨款 16 万捷克朗和 5.3 万英镑；同一天又决定为中共重要领导人到苏联治病提供 200 万卢布的贷款，等等。

在寻求苏联援助方面，中共最迫切的就是要求苏联各方面的专家和顾问尽快到中国来。在 4 月 9 日与科瓦廖夫谈话中，毛泽东“急盼苏联专家尽快来到中国”，以便“编制一份合理使用贷款的计划，首先是恢复工业和铁路运输等重要部门的计划”。谈到占领大城市的问题，毛泽东说，占领这些城市容易，但管理这些城市却很困难，尤其是上海，对于发电厂、自来水厂、大型企业及市内交通，中共都缺乏管理经验，因此担心“整个城市的生活瘫痪”。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毛泽东说：“至今我们还没有下定决心占领上海”。最后，毛泽东请求苏共在占领上海之前派来一批“专门管理上海的专家”。

5 月 3 日，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提出中共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经济建设问题，因此要求斯大林同意尽快向中共派遣苏联专家。6 月 9 日，毛泽东再次给斯大林发电说：“我们在讨论了中央计划、财政、经济组织机构以后，已比较准确地确定了我们所需要的苏联专家的数量及其专长”。电报明确告诉斯大林，中国所需要的专家不少于 600 名，并准备在 1949 年和 1950 年上半年接受这些专家，把他们安置到各计划、财政、经济机关和工业企业中去。毛泽东又特

苏联部长会议的命令（1949 年 2 月 6 日），  
. 3, . 65, . 444, . 32 - 34, -  
. c 88 ~ 89。  
库梅金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 年 6 月 17 日），  
. 3, . 65, . 363, . 12, -  
. c 147。  
- , . 548。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Uncertain Partner*, p. 63.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1949 年 4 月 19 日），  
. 45, . 1, . 331, . 24 - 25, -  
. c 120 ~ 121。  
费德林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 年 3 月 26 日），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0100,  
. 42, . 291, . 58, . 6 - 7;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  
（1949 年 3 月 30 日），. 3, . 65, . 363,  
. 4, - , c 108, 10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1949 年 5 月 14 日），  
. 3, . 65, . 363, . 6, 9, -  
. c 127 ~ 128。从俄国档案看，  
此期间提出到苏联治病的有江青、林彪、刘亚楼等。  
参见周恩来致菲利波夫电（1949 年 4 月 28 日），  
. 45, . 1, . 331, . 132, 沈志华、李  
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  
汇编》第 19 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存，第 97 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1949  
年 5 月 12 日），. . . , . . . ,  
. . . ( ) - ( )  
1919—1952, . . . ,  
3, 1940—1952, . . . , 2001, .  
574; 雷斯科夫致斯大林函（1949 年 5 月 25 日），  
. 100, . 36, . 140, . 1, . 13 - 16,  
20, 21, - , c 135。这  
笔款项到 7 月 21 日已支付 3 万卢布。贝斯特罗夫给  
费德林的报告（1949 年 7 月 21 日），. . . ,  
0100, . 42, . 291, . 58, . 33, -  
. c 169。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1949 年 4 月 13 日），  
. 45, . 1, . 331, . 15 - 21, -  
. c 116 ~ 120。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第 496 页。





别指出，第一批专家共 258 人，应于今年 6 至 8 月来华。电报还详细列表说明了拟聘 600 多名专家的所在专业。6 月 11 日，毛泽东给斯大林报告又提出要苏联派来国防工业的专家。

越是临近全面地掌握政权，中共就越感到对国家的管理，特别是经济管理是个难题，也就越需要苏联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中共已经表明了自己的亲苏立场，却还不知道苏共将来对中共政权究竟采取何种方针，而这决定着大规模苏联援助是否能够到来。为此，毛泽东需要尽快派正式代表团访问苏联进一步协商与沟通。

### 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重大收获

毛泽东最初考虑，在新政府成立后派任弼时和王稼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时间在 1949 年的 7 月或 8 月。5 月上旬，因任弼时患高血压病，代表团改由刘少奇、王稼祥和高岗组成。直到 6 月 11 日，毛泽东仍向莫斯科通报说，中共代表团要等 8 月人民政府成立后再访苏，以便正式签订贷款和专家的合同，同时能让苏联专家名正言顺地在华工作。刘少奇于 6 月中旬赶到北平做出访的准备，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决定代表团在新政府成立前访苏，启程的日期是 6 月 21 日。目前没有资料说明这一变化的原因，但很可能是因为新政府成立的时间推迟，而中国又迫切需要苏联的贷款和专家，已经不能再等待了。

6 月 26 日，刘少奇等人到达莫斯科，8 月 14 日离开苏联，其间高岗于 7 月 30 日先行回国。这次中共代表团出访的主要目的，其一是通过双方高级领导人的会晤，直接向斯大林表明中共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并听取苏共中央的意见；其二是了解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和态度；其三是寻求苏联的帮助和支援。根据目前掌握的档案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在访问期间，刘少奇与斯大林进行了 4 次正式会谈，其中 6 月 27 日和 8 月 5 日会谈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6 月 11 日会谈在克里姆林宫政治局会议室，7 月 27 日会谈在孔策沃斯大林别墅举行。刘少奇还在 7 月 5 日和 6 日就访苏活动安排问题与科瓦廖夫，在 7 月 23 至 25 日之间就国内外贸易问题与米高扬，在 7 月 30 日就对外政策问题与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举行了正式会谈。通过这些会谈，中苏双方进一步加深了沟通和

了解。此外，代表团的主要活动就是到苏联党和政府的各重要机构或企业参观，学习苏联的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49 年 6 月 9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 - 00192 - 01，第 30 ~ 38 页。这份重要的文件在俄国档案馆中始终没有找到。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1949 年 6 月 14 日），  
，45，  
，1，  
，331，  
，101 - 111，  
，  
，c 141 ~ 14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49 年 3 月 18 日），  
，538，  
，1，  
，331，  
，5 - 7，  
，  
，396 ~ 397。

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年，第 455 页。海因茨希教授依据周恩来的一次谈话，确认本来毛泽东想自己率团访苏。但笔者在所有相关的文献中都没有找到丝毫的证据，所以，很可能周恩来对罗申讲的是客气话，并为提出毛泽东访苏的问题作铺垫。参见罗申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1949 年 11 月 10 日），  
，0100，  
，42，  
，288，  
，19，  
，81 - 85，  
，  
，218 ~ 219；海因茨希著，张文武译：《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 303 页。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1949 年 6 月 14 日），  
，45，  
，1，  
，331，  
，101 - 111，  
，  
，c 141 ~ 147。

徐则浩编《王稼祥年谱（1906—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370 ~ 371 页；《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645 ~ 646 页。《刘少奇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646、653 页；《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217、219 ~ 221 页。如下文所说，这些时间的确定对于一些重大史实和重要文件的认定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  
，c 148 ~ 151；《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30 ~ 39、40 ~ 41 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4、410 ~ 415 页；  
，1996，  
，5 - 6，  
，56、58，中译文见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0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724、729 页。师哲回忆中苏工作会谈 4 至 5 次，也有著作称会谈 5 次。参见《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98 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12 页。但根据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可以确定的正式会谈只有这 4 次。有可能人们把 7 月 27 日晚宴上的谈话也作为正式会谈了，因为这次谈话时间很长，而且有文字材料。还可参见海因茨希对这一问题的考证《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 305 ~ 306 页。

，  
，163 ~ 164、172 ~ 175；刘少奇给米高扬的信（1949 年 7 月 22 日、7 月 25 日），  
，39，  
，6，  
，38，  
，166，  
，  
，c 169、170。没有看到刘少奇与米高扬会谈的材料，但刘少奇在 22 日信中提出了举行会谈的要求，而在 25 日信中提到了会谈的结果。



经验。苏联为此进行了周密安排，满足了中方的各项要求。

苏联为刘少奇的访问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在6月27日夜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几乎同意了此前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甚至中方没有谈到的事情，斯大林也主动提出帮助解决。首先是贷款问题，鉴于中国新政府尚未成立，斯大林决定由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贷款，年利率1%，以设备、机器和各种类型的材料、商品的形式提供给中国，平均每年6000万美元，为期5年，分10年偿还。斯大林说：由两党签订贷款协议，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关于专家问题，斯大林说：苏联已经准备好在最近按照中方的要求派出第一批专家。专家的待遇只需按照中国优秀专家的高水平报酬标准提供，如果需要，差额部分将由苏联政府补足。如果苏联专家在中国有不良行为，交由苏方处理。斯大林强调，“我们不容许苏联专家对待中国专家和中国人民采取傲慢和轻视的态度”。至于中国急需的派往上海的专家，斯大林说：苏联已经挑选了15名专家，可以随时派去。斯大林主动提到了新疆问题，他认为中共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并表示苏联可以提供40架歼击机，帮助中共迅速地驱散和击溃拦在途中的敌骑兵团。斯大林还建议，为了巩固国防，应当让汉族人向边境地区迁移，把汉族在新疆所占的人口比例从现在的5%提高到30%。关于海军建设，斯大林说：苏联准备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舰队，首先可以帮助打捞沉船，还同意派遣一支分舰队去青岛港，以帮助中国巩固海防。对于中共提出的建立莫斯科与北平之间航线的请求，斯大林说：苏联已经准备好，现在就可以着手组建，还答应帮助中国建立飞机装配和修理工厂，向中国提供最新型的歼击机。最后，斯大林提出，苏联准备在所有中国需要的方面提供全面帮助，但为了使代表团能够广泛和公开地进行参观和开展各种活动，建议使用东北贸易代表团的名义。

斯大林如此主动和慷慨的行为表明，苏共已基本确定了以中共政权为盟友的对华政策，至少要让毛泽东明白苏联是有此意向的。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斯大林的这一举动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刘少奇的访问也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第一，通过这次访苏，中共领导人进一步得到了莫斯科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刘少奇通过口头和书面的形式，详细介绍和解释了中共对内、对外政策，包括对苏关系的方针。这些汇报的内容，大部分都得到了斯大林的赞同和理解。在某些方面，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补充意见，如主张在谋求西方国家承认的问题上“最好不要急”；目前不要没收各帝国主义的在华经济企业，等一等再看；建议成立各省地方政府，以避免中央过分集权；应当要资本家与工人订立合同，以保障工人的利益；目前提出的共同纲领只是党的方针，应尽快着手准备国家宪法；尽早成立中央政府，以防敌人利用“无政府状态”捣乱等等。

最让中共感到欣慰的，恐怕是斯大林多次对中共作出的高度评价，特别是对苏共过去指导中共工作中的某些做法表示道歉。刘少奇在

刘少奇致斯大林信（1949年7月6日），  
45，. 1，. 328，. 51 - 55，

- 1949. //  
，1996，5，. 84 - 88；《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23~29页；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6日），  
. 65，. 363，. 20 - 23，  
，. 163~164。

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19~424页；《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18页。

档案原件显示，斯大林在这里画了一个问号，并划掉了“最”字。

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1949年6月27日），  
，. 45，. 1，. 329，. 1 - 7，

，c 148~151。这个纪要是经斯大林审阅过的，并按照他的指示，由科瓦廖夫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刘少奇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  
. 45，. 1，. 328，. 11 - 50，

，. 151~162；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7月18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30~39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05~409、419页。关于7月4日的报告，中国的档案也已经公布，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1~22页，内容与俄国档案完全一样。不过，在俄国的档案中有斯大林阅读时在文件上做的许多批注和画线，这些批注和着重线表明了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所提出的问题的态度和倾向性意见。

师哲回忆说：听过刘少奇回国后的汇报，“中央领导人对斯大林做的自我批评印象深刻，无不为之感动，受到鼓舞”。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26页。

7月4日的报告中谈到中苏两党关系时写道：“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即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尽管斯大林表示不同意中共服从联共（布）领导的提法，但对于中共真诚的态度，斯大林显然是颇有感触的。在7月27日的会谈中，斯大林主动谈到过去苏联在同中国共产党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其中主要是他在1945年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失误。他说：“由于不了解情况，我们过去曾经给中国的革命出了一些不好的主意，给你们的工作带来困难，干扰了你们。”斯大林对此表示歉意，并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党，在政治、理论和国家建设各方面都取得迅速发展，祝愿中共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刘少奇说：“我们还是你们的学生。”斯大林毫不迟疑地表示，学生也可以超过先生，革命的中心将会从欧洲转移到东方，那时你们的历史责任就加重了。我们会落后的，你们会进步很快，也一定会超过先生，希望中苏两国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讲团结。作为翻译的师哲感觉，斯大林是以深感内疚并抱有歉意的语气讲这番话的。

第二，通过中苏两国进行国际分工的建议，斯大林表明了苏联赞同与新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意向。斯大林主动提出，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就是说要分工合作。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它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它们参考和吸取……因此，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咱们两家来个分工：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在这方面多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西方的社会民主运动停滞了下来。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你们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

承担的责任。也许在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问题方面，我们苏联人比你们强一些。不过如果谈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到实践方面，你们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了许多东西。在中苏两党关系的历史上，出现这种亲密和融洽的现象，应该说还是第一次。

第三，刘少奇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苏联为中国经济和国防建设提供更多的援助，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基本上满足了中国方面的要求，双方也签署了一些具体协定。

关于贷款协定。尽管中国急需贷款，但对于如何使用这笔贷款还没有具体计划。斯大林提出由双方组成一个共同委员会，确定使用贷款的货单。毛泽东要求把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请苏联专家到中国来商定贷款的具体内容。贷款原则上50%用于东北，其次是华北和西北的经济恢复。

7月11日双方商定，组成贷款协议起草委员会，协议由高岗以东北政府名义签字，以便于提交最高苏维埃批准，早日付款。7月23日达成初步协议，7月26日中共中央对草案提出一些具体修改意见，确定协议应由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签订，俟中国政府成立和中苏建交后，再以同样条件由两国政府签署。此外，删除购买苏联武器的内容，“使借款货单完全成为建设借款”。

刘少奇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49年7月27日）；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3页；《刘少奇传》下卷，第651~652页；《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40~41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14~415页。

刘少奇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49年7月27日）；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12页；

//

，1992，1-3，78~79。

刘少奇等致朱德、周恩来电（1949年7月2日），毛泽东致刘少奇等电（1949年7月4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60~61页；《刘少奇传》下卷，第647页。《刘少奇年谱》（第220页）和《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14页）均把毛泽东7月4日的电报说成是8月4日发出的，有误。

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7月18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31页。

《刘少奇传》下卷，第651页；中共中央致刘少奇等电（1949年7月26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175~177页。后来，贷款协议确是以两国政府名义正式签订的，但由于朝鲜战争爆发，这笔贷款主要用于购买武器了。参见沈志华《对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83~93页。

贷款协定于 7 月 30 日由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和马林科夫（代表苏共中央）签字。

关于专家协定。早在米高扬离开西柏坡后，1949 年 1 月 14 日周恩来就曾致电陈云、林枫，提出应为聘请苏联专家商定一套待遇制度和合作办法，以便共同遵守。出国前王稼祥又让邓力群准备了一份有关方针政策文件。但是，目前没有看到中方准备的这些材料。在 8 月 5 日夜晚中苏领导人的会谈中，斯大林重申了他 6 月 27 日关于苏联专家待遇的意见。据师哲回忆，斯大林再次强调苏方人员如果犯了错误，一律由苏方处理，还提出苏联专家家属的生活费用应由中方承担。会谈后，双方讨论并商定了《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协定是以联共（布）中央和中共中央的名义签订的，其中规定：派到中国的 600 名苏联专家将以顾问的资格在中国各部门负责人领导下工作，期限一年，苏方负责人为科瓦廖夫；苏联专家的薪金依照中国同等职务和资格的中国专家所规定的标准，以中国货币支付，并保证提供中国专家所享有其他供应和补贴；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期间，中方应无偿提供住房、家具及取暖设备。8 月 9 日，苏联部长会议开会讨论并作出了关于派遣苏联专家赴中国的决议。同日，刘少奇将协定全文报请中央批准。8 月 10 日，中共中央回电，同意照此签字。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曾反复强调的如苏联专家犯有错误应由苏方处理的原则，在协定草案中不见了。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刘少奇致函斯大林说，希望让科瓦廖夫和已经确定的苏联专家同他一起回国，其余专家可于 8 月中下旬与王稼祥同行，并请求斯大林下达指示，加快专家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斯大林阅读信函时，特意在这段话下面画了着重线。当刘少奇 8 月 14 日离开莫斯科时，有 220 名苏联高级经济干部和工程师与他同车而行。

关于为中国建立大学。刘少奇在 7 月 6 日提出，希望苏联政府建立一所大学，专门为中国培养工业、贸易、财政、法律等方面的专家和干部，学员 1000 人，学制 1 至 4 年不等。斯大林在 7 月 11 日的会谈中说：这是好事，有困难，但可以办。7 月 25 日，毛泽东去电表示：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一所中国大学，经费应讲明由中国担负。7 月 29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或许是考虑到在首都设立一所中国人的大学过于招摇，苏方提出把学

校设在哈萨克斯坦的阿尔马达（阿拉木图）市。8 月 7 日，刘少奇和王稼祥建议把这所大学改设在北平，请苏联派教授来中国讲课，毛泽东复电同意这个建议。8 月 13 日，苏共中央外交委员会讨论并起草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随后，苏联教育学专家费森科和菲利波夫被派往中国帮助筹划学校的建立。这所学校就是著名的中国人民大学。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 册，第 176 页。《刘少奇年谱》（第 219 页）和《刘少奇传》（第 653 页）都说该协议是“代表中国和苏联签订”的，不确切。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545—546 页。

《王稼祥年谱（1906—1974）》，第 370 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15 页。

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1949 年 8 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192-01，第 9~10 页。这是一份有关苏联专家待遇的极其重要的文件，其内容与后来毛泽东访苏后双方签订的正式协定差别很大。目前尚未看到相应的俄国档案。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44 页；《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 册，第 250 页。

刘少奇致斯大林信（1949 年 8 月 2 日），3，65，364，1-2，1996，5，93。

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1949 年 8 月 26 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45 页。

刘少奇致斯大林信（1949 年 7 月 6 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23~29 页；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 年 7 月 6 日），3，65，363，20-23，163~164。

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1949 年 7 月 18 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30~39 页。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9 年 7 月 25 日），45，1，328，137-140，170~171；《刘少奇年谱》下卷，第 219 页。

1919—1952，591。

毛泽东致刘少奇、王稼祥电（1949 年 8 月 7 日），《刘少奇传》下卷，第 653 页；《刘少奇年谱》下卷，第 220 页。

547~548。

关于中国人民大学创立的过程，详见 Douglas A. Stiff-ler, "Creating 'New China's First New-Style Regular University', 1949—50", in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eds.),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88~308。



此外，中国希望派一批经济管理干部去苏联进行短期学习的要求，也得到了满足。

关于空军和海军建设。7月10日，根据朱德建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100架左右飞机，组建一支空军攻击部队，准备1950年夏季夺取台湾。7月26日，中央军委决定以第14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和军委航空局组成空军领导机关，派刘亚楼等赴苏具体商谈购买飞机、聘请专家顾问和帮助开办航校等事宜。中央书记处电告刘少奇与苏方商谈。在7月27日的会谈中，苏方答应向中国出售雅克式战斗机100至200架、轰炸机40至80架及备份机件和重磅炸弹，也同意为中国培训飞行员，只是提议不必来苏联，航空学校可以设在中国。8月6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因国民党飞机在长江一线轰炸造成严重损失，请苏联提前运来360门高射炮。经商谈，苏联军方于8月9日提出了一个组建高炮兵团的方案：以3.7厘米和8.5厘米高射炮各180门组成10个高炮团，一周后即可准备好；为训练中国炮手，苏联将派22名教练在炮兵上校或少将带领下，随中共代表团去中国。11日中方回电，完全同意苏联方案，提出再订购360挺高射机枪。除了6月27日谈到的对海军的援助外，根据刘少奇的要求，斯大林在11日会谈中又答应在旅顺帮助建立一所海军学校，并帮助中国建立起海岸防御体系。

不久，苏联便履行了诺言。1949年9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责成武装力量部向解放军总部及军事学校派遣领导干部、顾问、教员、教官及服务人员共915人，其中空军780人，海军86人，炮兵21人，所有费用均由财政部从苏联部长会议准备金中支出。同时，向空军提供各种教学用飞机334架、装有指挥仪和测距仪的高射炮360门（8.5厘米的120门，3.7厘米的240门）、高射机枪360挺及炮弹，价值总额2650万美元。作为附件给军事顾问和教官的指令，要求他们服从中方的领导，尊重中国军人，不准收受各种额外的劳动报酬，不准享受协议书中没有规定的各种无偿物质服务等。11月4日，为保证中国航校和高射炮团组织筹备和正常展开工作，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决议，再向中国增派97名空军顾问、教官及军医等服务人员，供应500辆汽车、12台拖拉机、6架2型飞机、91台航空发动机及其他辅助设备，价值2800万卢布。11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作出

决议，向中国提供战斗机、教练机和运输机以及航空发动机、高射炮、机关枪等装备，总共为1.258亿卢布。以后两个月，部长会议又连续三次决议向中国提供伞降物资、机场装备、航空汽油等共计1.663亿卢布。

关于新疆问题。对于斯大林的尽快解放新疆的建议，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刘少奇在7月4日的报告中说，解放新疆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肃清通往新疆的道路和解决交通工具的问题。7月6日，刘少奇告诉斯大林，毛泽东同意苏联帮助解放新疆，并建议将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具体化。11日，斯大林

刘少奇致斯大林信（1949年7月6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26页；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6日），  
，3，.65，  
，363，.20-23，  
，163-164；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9年7月25日），  
，45，.1，.328，.137-140，  
，.170-171。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29页；吕黎平：《赴苏参与谈判援建空军的回忆》，《军事史林》1994年第1期，第25页。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236页。

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8月10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47~48页；《刘少奇传》下卷，第653页；《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21页。

刘少奇致斯大林信（1949年7月6日），  
，45，.1，.328，.51-55，

，1996，5，.84-88；《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23~29页。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7月18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35页。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及附件（1949年9月19日），  
，3，.65，.418，.413-422，  
，c.182-186；  
07，.23a，.236，.18，.32-33、126，转引自  
。

（1949—1952.）//  
，1994，6，.75。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49年11月4日），  
，3，.65，.418，.34-38；梅尼希科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1月20日），  
，c.212-214、344-347。

刘少奇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  
，.45，.1，.328，.11-50，  
，.151-162；刘少奇致斯大林信（1949年7月6日），  
，.45，.1，.328，.51-55，  
，1996，5，.84-88；《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26~27页。

答复，新疆没有飞机场，空运军队还无法办到，至于帮助扫清通往新疆的道路，苏联可派一个团四五十架飞机，很容易解决问题。看来，斯大林此时对空运问题有些犹豫，不过答应派飞机助战已令中共感激。7月23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电报说，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援助，包括几十架飞机助战”，建议彭德怀“冬季即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7月25日，毛泽东向刘少奇通报说，秋季占领兰州、西宁等地后，即可准备进取新疆，并指示代表团的政治秘书邓力群尽快赶到伊宁，“在那里建立与北平的无线电联系”。刘少奇向马林科夫通报了这一情况，并通过师哲（卡爾斯基）与苏联商定了新疆与莫斯科之间进行无线电联系的呼号、波段和频率，因为“新疆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系在最初阶段是极其必要的，借此新疆才可以与北平建立联系”。第一次无线电联系的时间定于8月14日晨。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阿里斯托夫的帮助下，邓力群在新疆建立了与北平及莫斯科的电讯联系，并结识和拜访了三区的领导人。后来，中共对新疆问题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力群电台”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新疆的和平解放，苏联空军没有用上，反而是空运在帮助解放军迅速入疆时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11月5日，第6军军直机关及下属第17师（炮兵除外）共计12446人，还有武器装备125734吨，就是租用苏联航空公司的45架C-54型运输机，分别从酒泉运送到哈密和从哈密运送到迪化的。不过，对于中方提出的修建一条从苏联经新疆连接中国内地的铁路的建议，斯大林认为线路太长，可以先考虑铺设石油管道。作为替代方案，他主张可以修建经外蒙古库伦至张家口的铁路。

当然，这次访问也有一些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其中主要是如何处理1945年的中苏条约和帮助中共解放台湾的问题。

关于中苏条约问题。这主要是指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问题，恰恰在这些问题上，反映出中苏之间的利益冲突。米高扬走后，中共显然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考虑。访苏代表团出发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刘少奇、王稼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其中谈到新中国建立后如何处理原中苏条约问题时，毛泽东说“可以谈谈看”。对此，中共采取了试探的做法。在中

共中央7月4日递交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处理，先是说“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但接着在谈到具体处理方式时又说，中方考虑有三种：（1）中国政府宣布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重新签订新约，对原有文字和内容有所增减；（3）通过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原状，以后再说。斯大林在前面那句话下面画了着重线，并写道：“对。”而对于中方提出的三种形式，斯大林的批示是：“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在7月11日会谈中，斯大林向刘少奇表明了这个意见。其中关于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问题，因为双方在西柏坡均已表态，这次就没有涉及。不过，在刘少奇来莫斯科之前，斯大林从科瓦廖夫那里了解到：在谈到有关长春铁路的问题时，

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7月18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34~35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44页。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9年7月25日），  
，45，1，328，137-140，  
，170-171。

刘少奇致马林科夫信（俄文）（1949年8月），卡爾斯基致米克拉舍夫斯基信（俄文），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004-03，第10页；109-00004-04，第11~14页。

关于邓力群在新疆的活动以及苏联在解放新疆中所起作用的详细情况，参见邓力群《“力群电台”收发的电报选编》（《中共党史资料》，1990年第36期）；邓力群《新疆和平解放前后——中苏关系之一页》（《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另参见朱培民《新疆和平解放始末》（《中共党史资料》第32辑）；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等编《新疆和平解放》，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0、33~36页；2001年6月至9月笔者采访王亚志记录。王亚志时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参谋。

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7月18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35页。几个月后，中苏签订了修建这条铁路的协定。

苏联外交官贾丕才回忆说：“斯大林对毛泽东不信任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是旅顺、大连和长春铁路问题”。Goncharov, Lewis and Xue, *Uncertain Partner*, p. 67. 徐则浩：《王稼祥传》，第456页。

刘少奇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  
，45，1，328，11-50，  
，151-162；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7月18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33~34页。

尽管高岗和陈云表面上都坚持认为条约是平等的和令人满意的，但“中国人暗中想要全面控制铁路，实际上他们正在尽力从苏联人手中夺取这条铁路的管理权”。斯大林显然认为还是将问题搁置起来要好一些。

但是，在西柏坡没有谈到的大连问题上，双方还是交换了意见。其一，中方希望能够开放大连港，以利于同日本和香港做生意，还询问是否可以允许美国和英国的商船进出，为此，中方甚至愿意把条约期限从30年延长至60年。其二，中方希望在大连和东北确定统一的货币，以减少外汇负担，恢复大连的工业。对第一个问题，7月11日斯大林明确答复：“在各国未承认中国政府、对日和约未订立以前，大连港口应为中苏两国所利用。”实际上是回绝了中方的请求。对第二个问题，鉴于苏联内部有不同意见，斯大林提出让东北与大连苏联占领当局“商量解决”，原则上“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

还有一个与中苏条约有关的就是蒙古问题，尽管知道斯大林的明确态度，但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还是婉转地反映了一些中国的看法，而作为中共的表态，报告的措辞也是有所保留的：“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如果蒙古人民共和国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在会谈中，双方都没有提及这个问题。显然，此时中苏都致力于友好和结盟，宁可把这个敏感而棘手的问题搁置，而不愿节外生枝。

莫斯科会谈中另一个隐含的分歧是解放台湾问题。毛泽东在7月25日要刘少奇转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明确地提出希望苏联在解放台湾的问题上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电报说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预计在1950年下半年开始，此前必须建立空军部队和海军舰队。除了要求苏联为中国提供飞机和训练飞行员外，毛泽东还试探性地提出请苏联空军和海军专家及飞行员参加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刘少奇是否或怎样向斯大林转达了这些话，目前看到的档案文献无法证实。不过，斯大林在7月11日的会谈中反复强调的基本思想是：我们不怕战争，反对战争，尽一切努力制止战争；和平是最重要的，要争取和平多几年。科瓦廖夫回忆说，斯大林还指出，苏联从军事上支援进攻台湾，将意味着同美国空军和海军发生冲突，从而为他们发

动新的世界大战提供借口。此外，苏联在战争中已经承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俄国人民不会答应参与这场冲突。在7月27日的会谈中，斯大林重复了这些看法。会谈结束时，刘少奇宣布撤回请求援助的要求，表示这个问题已经过

//  
，1992，1-3，86；  
有关文件可参考科瓦廖夫的私人档案，见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Uncertain Partner*, p. 63.  
刘少奇致斯大林信（1949年7月6日），  
45，1，328，51-55，  
，1996，5，87；《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27页；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6日），  
3，65，363，20-23，  
，163~164。  
刘少奇致中共中央（1949年7月18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35页。1945年8月苏联占领旅大地区后，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有朝鲜币、伪满币、日本币、苏联红军券等。1948年11月进行了第二次币制改革，经苏联占领当局批准，关东公署发出通告，由关东银行将流通中的苏联红军券及一切旧币全部收回，统一发行由苏联印刷的关东币。东北币是由东北银行在战争期间发行的地方流通券，1949年4月开始在旅大地区流通。1949年3月12日陈云向苏方提出了东北货币统一的问题，苏联代表科瓦廖夫及苏联财政部和外交部都表示反对，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经与苏联当局协商，1950年6月16日东北银行奉命接管了关东银行，改为东北银行大连分行。由此，用东北币统一了东北全境的货币。1951年3月20日，根据周恩来签署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令》，“决定收回东北银行和内蒙古人民银行所发行的地方流通券”，以全国统一的人民币为法定货币单位。见1949年3月13日科瓦廖夫致莫洛托夫电，  
45，1，331，1-2；3月22日斯克沃尔佐夫致维辛斯基的信，兹韦列夫致莫洛托夫的信，  
0100，42，291，59，4、5-6，  
，c. 104-107；1948年12月2日关东公署关于币改工作总结，大连市档案馆，2/1/228，第21~31页。参见陈文登编著《旅大特殊时期老票证（1945—1955）》（大连出版社，2007年）第1~14页；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大连市志：金融志·保险志》（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2~78页。刘少奇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  
45，1，328，11-50，  
，151~162。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9年7月25日），  
45，1，328，137-140，  
，170~171。  
刘少奇致中共中央（1949年7月18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36~37页。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06~407页。

去了。从斯大林的一贯做法看，他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很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帮助中国建立空军和海军就是援助了，解放台湾是中共自己的事情。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中苏之间满足对方要求的限度取决于他们对国际问题观察的一致性，以及他们对这种合作是否符合各自长远目标的认识。由于中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共同的认识基础，在国际斗争中有一致的战略考虑，因此结成同盟关系是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的。从这一基点出发，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努力寻求在重大问题上达成谅解，而在有争议的问题上采取暂时搁置或退让的方针。这就是莫斯科会谈得以成功的原因。由此可以认为，刘少奇访苏以后，中苏战略合作的架构已经形成。也正是在这样判断的基础上，毛泽东公开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和建国方针。

## 毛泽东宣布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

194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毛泽东在文中宣布了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毛泽东在3月七届二中全会所说的“发表文告”说明与苏联关系的那个“机会”终于到了。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宣布“一边倒”？这一举动的结果又如何呢？

过去研究者受当事人对刘少奇访苏时间记忆错误的误导，认为毛泽东此举是向斯大林示好，为莫斯科会谈铺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一边倒”宣言是6月27日会谈的直接结果。如前所述，毛泽东早在一年多以前就确定了倒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方针，对此，他不仅在党内反复宣传，而且一直希望让斯大林明白这一点。尽管他访问莫斯科的愿望没有实现，但米高扬访华总算让苏联对中共的立场有了全面而深刻的了解。但是斯大林究竟是什么立场，毛泽东还没有把握。在这个问题上，莫斯科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和完整的说明，苏共与中共接触时的谨慎表现更让毛泽东心里没底。斯大林在6月27日会谈中的表现让毛泽东了解了苏共的态度，6月28日下午，毛泽东接到了刘少奇关于会谈情况的报告。这正是他期待已久的结果，于是，发表文告的“机会”也就到来了。当然，毛泽东在斯大林刚刚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苏共的立场后就发表宣言，还有一

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巩固刘少奇访苏的成果，进一步加强中苏结盟的趋势。为此，毛泽东必须让生性多疑的斯大林放下心来支持和援助中共，而在这方面，最敏感的就是中共正在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频繁接触的情况。

早在1948年底苏联驻华使馆就报告说，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人决心直接同共产党接触”。1949年3月10日，司徒雷登请求国务院授权他不仅以外交官的名义，而且以久居中国的老朋友的身份，与中共高层接触，以便消除他们对美国的误会，并希望能对中共有所影响。4月6日艾奇逊回电，授权司徒继续留在南京，寻机与中共接触。国民政府迁移广州时，4月12日和22日，国务院决定听取司徒的建议，美国使馆不迁走，而是留下来收集情报、保护侨民，并与中共当局建立联系<sup>①</sup>。中央情报局则更明确

，1991，6，88.

在1949年10月进攻金门战役失利后，毛泽东访苏时明确提出要苏联派志愿空军或秘密部队帮助攻占台湾。斯大林则表示，可以提供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但苏联的空军和海军都不能直接参与作战。以后，中共就没有再提这个问题，而是不断催促苏联提供空军和海军装备。参见沈志华《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党的文献》2008年第4期）。至于苏联态度的转变及其原因，参见沈志华《中共进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1949—1950）》（《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3期）。

Chen Jian,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and China’s Entry into the Korean War”, *Working Paper*, 1992, 2,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p. 1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2页。

参见沈志华《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仔细查阅米高扬访华期间的12个报告可以看出，毛泽东几次要求苏共表明对中共的立场和看法，均未有结果。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表示赞同或支持中共的做法，但米高扬始终没有全面阐述苏共对中共的方针。

《刘少奇传》下卷，第647页。

1948年12月27日马卢欣关于美国在华政策的备忘录，100，42，296，117，7-23，《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6卷，第1333~1343页。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ch 10, 1949;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Stuart, April 6, 1949, *FRUS*, 1949, Vol 8, pp. 173 ~ 177, 230 ~ 231.

①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Stuart, April 12, 22, 1949, *FRUS*, 1949, Vol 8, pp. 677 ~ 678, 682 ~ 683.



地表示了倾向性意见：观察几个月或一年后便应承认中国新政府。毛泽东向来敌友分明，中共既确定了走苏联的道路，在冷战的格局中，自然是要坚持反美立场的，何况美国一直在支持蒋介石。不过，从策略上讲，毛泽东并没有采取一种僵硬的立场。从处理华德事件的过程就可以看出，中共在对美关系上始终是灵活的和留有余地的。在攻占上海前夕，毛泽东提出，如果美英能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可以考虑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于是，便有了黄华与司徒雷登互访的情节。

5月7日，黄华与司徒的秘书、燕京大学的同学傅泾波第一次见面，提出在承认中国问题上，美国应表现主动，并接受了傅泾波的建议，答应见“老校长”司徒雷登。5月10日，毛泽东致电南京市委，同意黄华与司徒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的意向为目的”。电报叮嘱说，应申明谈话是非正式的，如司徒态度友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如美表示愿意与中共办交涉，不要拒绝。5月13日黄华拜访司徒，近两个小时的谈话，按照司徒的描述，是“友好而不拘礼节的”。当黄华介绍了中共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后，司徒说：共产党目前还没有政府；国际惯例是任何得到本国人民明确支持，并有能力和愿意履行国际义务的政府都可以得到承认。对于黄华提出的美军撤离青岛基地的要求，司徒答应转达，并说，美国已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与中国内战。但司徒回避了与国民党政府断交的问题。对于上述接触的情况，中共及时向苏联进行了通报。在与傅泾波会见前（5月4日），以及两次与美方接触后（5月10日和15日），黄华都把中共的想法和会见的情况告诉了留在南京的苏联参赞列多夫斯基。毛泽东则在5月22日向科瓦廖夫介绍了与美国接触的整个情况，并特别说明中共对美国不感兴趣。斯大林表示同意毛泽东的立场，并感谢中共通报的情况。

毛泽东在党内和对苏共的讲话中，多次表示对美国是否承认中共政权既不抱希望，也不感兴趣。这是他的真实想法，至于让美国人感觉到他很看重这一问题，那只是一种策略。毛泽东担心的是在胜利的最后关头美国会采取某种行动，使中国革命功亏一篑。占领上海的第

二天，5月28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发的一封电报指出，“近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迹象”，故应“预筹对策”。保持与司徒接触，让美国人心燃起对中共的某种期望，就是毛泽东进行的心理战。因此，在得到莫斯科的认可后，中美接触进一步加强了。

与司徒雷登会见后，黄华又见过两次傅泾波。傅转达司徒的话说，他对上次谈话是负责任的，美国舰队已于5月21日撤离青岛。6月3日，黄华还以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长的名义会见了留在南京的所有外交官，宣布了中共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及其他具体政策。会场气氛十分活泼。<sup>①</sup>6月6日，黄华再约司徒和傅泾波在外事处会晤。关于中美关系，双方重复了上次谈话的内容，给司徒留下的两个明确印

ORE 45 - 49, Probable Developments in China, 16  
June 1949, CIA Research Reports China, Reel - 1 -  
0277, pp. 27 ~ 48.

参见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83页。

关于这个问题，过去已有很多研究，但看法不一。况且，有关中共的立场和态度，研究者依据的主要是美国人的转述和当事人的回忆。最近，《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的出版，弥补了这一缺憾。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11, 1949, *FRUS, 1949*, Vol 8, pp. 741 ~ 742; 黄华：《亲历与见闻》，第 80 页。司徒雷登在日记中记载的这次会见是在 5 月 6 日，这应该是指美国时间。陈礼颂译，傅泾波校：《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执期间前后》，香港文史出版社，1982 年，第 66 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87~88页。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14, 1949, *FRUS, 1949*, Vol 8, pp. 745 ~ 747; 黄华：《亲历与见闻》，第 81 页；列多夫斯基著、陈鹤编译：《1949 年在南京与黄华的三次谈话》，《中共党史资料》2005 年第 4 期。司徒和黃华对这次谈话的记述略有不同。

列多夫斯基著、陈鹤编译：《1949年在南京与黄华的三次谈话》，《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1949年5月23日），  
 . 45, . 1, . 331, . 66 - 69, -  
 , c 132 ~ 134.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 (1949年 5月 26日),  
 . 45, . 1, . 331, . 73 - 75,  
 , с 136 ~ 138。

⑤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10~511页。

④ 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2页。

象是，中共急于想让美国政府抛弃国民政府，想让美国在承认新政权方面表现出主动。司徒感到，黄华的态度“十分友好”。

6月8日，傅泾波再见黄华称，与司徒雷登研究后认为：关于中美关系，“美国现在很难作出正式表示，此需司徒返美后努力；但司徒需要知道中央更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因此，司徒表示有意在回国前见到周恩来。得到报告后，中共中央非常谨慎，决定通过非官方渠道处理这件事，便让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去信邀请司徒访问北平。6月14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复电南京市委：司徒雷登及其秘书傅泾波如再要求来北平，可同意其“在返美前至燕京大学一行”。至于是否与周恩来见面，“待其到北平后再定”。

6月18日，南京市委报告：傅泾波往见黄华称，“司徒雷登最近得到美国国务院指令，赞成其与中共联络，并希望司徒雷登返回美国两个月后，暂时以私人身份（解除大使职务）回北平，将来承认中国新政权时，重新任命其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开中国期间，以美国大使馆参事周维陆与中共方面继续保持联系”。由于司徒雷登没有提到返回美国前要去北平之事，电报特别请示，是否需要暗示司徒雷登，“使他主动提出去北平要求”。6月21日，周恩来答复：陆志韦已“去信暗示司徒，如请求来平，可能得到中共许可。他如不再提，我们暂时不必表示，以观其变”。但毛泽东在这里又特意加了一句：“待他返美前约十天左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显然，此时毛泽东还不愿放弃这条线索。

6月24日，司徒接到陈明枢从北平来电，说他已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顺利”。据黄华回忆，他后来从周恩来处得知，6月初司徒获悉陈铭枢和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将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便请陈铭枢向中共中央转达他想见中共领导人的意愿。他还对罗隆基说，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借给新政府50亿美元，这接近印度15年所得的贷款。陈铭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转达了司徒的要求后，在给司徒的信中转达了毛泽东的答复：“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但罗隆基到北京后，未向毛转达司徒雷登的口信，只是在许多年后才告诉周恩来。

《司徒雷登日记》6月26日（美国时间）记载：周裕康从北平回来，说毛泽东称，会像老朋友一样欢迎司徒雷登。司徒写道：“显然，黄华已把我打算北上的愿望报告上去了。”同日，司徒还接到陆志韦6月16日发出的信，也提到北平之行。这时，双方的态度还是积极的。

6月27日，傅泾波携陆志韦的信拜访黄华，信中说周恩来曾告陆志韦，毛泽东已宣布司徒雷登希望访问北平燕京大学之意。中共希望司徒将燕京之行与交谈贸易及国际问题分开。傅泾波称：“陆来函很突然，使司徒颇感惊异迷惑，不知用意所在。”又称：司徒雷登现因美国国会不久休会，时间迫促，亟须回国，加以国会内部意见庞杂，恐不能去燕京大学，有意请傅泾波及黄华二人去北平。黄华当即指出：司徒雷登本人月初曾表示欲北访燕京，而中共中央是否同意，尚未获得指示。如司徒希望北上，愿去电问明情况。傅表示同意，但试图要中共方面主动邀请司徒北上，并允许其乘留在南京的美机去北平。6月28日，经报告周恩来并获

---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8, 1949, *FRUS*, 1949, Vol 8, pp. 752 ~ 753; 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2~83页。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21页；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3页。司徒雷登日记没有提到这次会见，不过，他在6月8日致国务卿电中所提回国后再重返中国，以便说服中国采取独立的民族主义政策，抵制亲苏路线等意见，与傅讲的意思相符，只是没有提到要见周恩来的情节。参见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8, 1949, *FRUS*, 1949, Vol 8, p. 754。后面的情节也说明，司徒不想让华盛顿知道他在问题上的主动姿态。

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3页；《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21页。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21~22页。黄华的回忆没有提到18日的会见，在《司徒雷登日记》（第73~74页）中，6月17日（美国时间）这一天记的是：“华府传来关于我回国等消息……傅往见黄华”。但是，在6月30日给国务卿的电报中，谈到他受邀去北平的背景时，司徒称：6月18日，黄华主动提出要安排他去北平，而傅没有表态。参见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30, 1949, *FRUS*, 1949, Vol 8, p. 766。笔者判断，司徒雷登因不愿承担责任而没有对国务院讲实情。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19页。

《司徒雷登日记》，第74页。

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4~85页。

《司徒雷登日记》，第75页。

得指示后，黄华再度拜访司徒，告知中共中央“同意准许司徒去燕京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司徒雷登说：因国会即将休会，时间上恐来不及，同时国会内部派别复杂，此时去北平很容易引起评论，增加不便。他决定将此事报告国务卿艾奇逊，由艾奇逊决定他有无必要去北平。黄华表示，是否去北平，由司徒自己考虑决定。当司徒北上进入到实质性操作阶段的时候，双方都明显地希望对方表现出主动。

6月30日，司徒致电国务卿，告知6月28日黄华来访的情况，并分析了北上的利弊，请“国务院考虑和决定”。但此时中共的态度已经改变。同一天，周恩来电告南京市委并华东局：责成黄华严格按照28日中央的说法答复司徒雷登，并特别叮嘱说，司徒雷登北上燕京及与中共当局会面两事“均为司徒所提出，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电报还说，司徒雷登北上只能乘火车，不许乘美机，如他“借口不乘美机即无法赶回华盛顿，可置之不理”。电报最后表明，“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显然，这时中共对于司徒是否北上已经不感兴趣，特别是不想让美方以此制造舆论，说中共有意与美国发展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当局也不愿走出冒险的一步。7月1日，艾奇逊电告司徒，最高层指示他不得访问北平。第二天，傅泾波向黄华通报了这一情况。中共高层与美方的接触到此告一段落，这一停顿竟长达22年。

中共并没有向莫斯科隐瞒与美国继续接触的情况，特别是列多夫斯基在6月11日会面时说过“莫斯科很关心这个问题”以后。几乎每次与傅泾波和司徒见面的情况，黄华都向苏联参赞进行了通报。不过，从列多夫斯基的札记看，黄华努力要让莫斯科相信，司徒与中共高层的会见，是美国方面主动提出的，并且表现积极。而中共则认为，这样做有利于了解美国的情况，并让美国人对改善中美关系寄予希望。值得注意的是，黄华对列多夫斯基说，他曾拒收司徒雷登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而这个情节在司徒雷登的报告和黄华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及。此外，艾奇逊7月1日否定司徒雷登北平之行的情况，黄华见到列多夫斯基时也只字未提。很明显，一旦司徒成行，中共希望莫斯科理解，

这是美方积极促成的，而对于中共来说，这只是一个策略。为了表明中共的反美立场，《人民日报》在6月19日公布了刚刚破获的美国间谍案，24日又刊登了一篇批判英美外交为“特务外交”的文章。6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要求尽力寻找能够指控美沈阳领事馆参与间谍活动的人证、物证，并考虑在间谍案宣判后，以同样理由驱逐美领馆的全体人员。

斯大林在6月27日明确表示了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后，毛泽东更坚定了倒向苏联的信心，同时也更担心与美国的接触会引起斯大林的误解和疑心——6月30日的电报充分反映了这种心态<sup>①</sup>。于是，在同一天，毛泽东决定公开发表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22~23页；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3~84页；《司徒雷登日记》，第76页。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30, 1949, *FRUS*, 1949, Vol 8, pp. 766~767.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20页。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30, 1949, *FRUS*, 1949, Vol 8, p. 769.

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4页。

关于美国学者长时间争论的一个问题，即战后美国是否由于政策把握不当而失去了与中共发展关系的机会，笔者认为这一机会只是出现在1944年夏到1945年春，到马歇尔使华时也还有一线希望，然而到1949年，美国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原因就在于斯大林抢先确定了与中共结盟的政策，而毛泽东也已经决心向苏联“一边倒”了。近期美国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参见 John Carver, “The Opportunity Costs of Mao’s Foreign Policy Choices”, *The China Journal*, 49, January 2003, pp. 128~130; Chen Jian, “How to Pursue a Critical History of Mao’s Foreign Policy”, *The China Journal*, 49, January 2003, pp. 140~141.

列多夫斯基：《南京札记》，未公开的手稿，第47、47、52、54页。转引自《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419~421、423页。

《人民日报》1949年6月19日、6月24日。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30~33页。

① 非常巧合的是，6月30日这一天，苏联驻华使馆呈递了一份关于《美英反动派指望民主中国出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备忘录，其中写道：从最近发表的文章的内容看，美英宣传非常注意选择一些能够刺激中国人尤其是中共党员民族感情的题目，其主要目的是在民主中国和苏联之间、中共和联共（布）之间制造敌对关系。1949年6月30日苏联使馆关于美英在华动向的备忘录摘要，……，100，……42，……296，……117，……29-36，《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6卷，第1437页。

“一边倒”的声明。也是在这一天，毛泽东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的活动，并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等一千人进行公开审判。接着，在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发表后，毛泽东在一个月内连续发表了五篇批判美国政策的评论文章。斯大林对毛泽东发表的宣言非常满意。中共中央在7月4日的报告中解释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在有关外交方面的问题“我们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的指示”一句话旁，斯大林画了着重线，并批注：“好。”很快，7月6日的《真理报》在头版位置全文刊登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并且出版了单行本，《新时代》杂志还发表了署名文章《毛泽东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进行详尽介绍。

中苏双方在西柏坡明确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性，在莫斯科则进一步明确了各项方针政策的一致性，至此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已经确立。然而，作为同盟关系，这里还存在一个重大漏洞和隐患，即国家利益问题。不错，中苏结成同盟的意愿首先是出于对各自政权的安全和

稳定的考虑，在这方面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但国家利益还涉及主权、尊严、经济等各方面的问 题，而在这些问题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双方将要面临的分歧和冲突是十分明显的。对此，斯大林和毛泽东都非常清楚，双方在涉及国家和民族利益方面缺乏协调和一致，同盟也是不会稳定的。这些问题必须解决，而且只有在最高层面解决，这就是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目的和任务了。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历史系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 上海 200241）  
（责任编辑 高远戎）

杨奎松：《华德事件》，第117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3～1509页。  
刘少奇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  
．45，．1，．328，．47，  
，．160。  
《人民日报》1949年7月9日、7月31日；Goncharov, Lewis and Xue, *Uncertain Partner*, p. 64。

《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2期要目

对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的理论思考 ——以中共党史特色专业建设为例 (熊 辉 陈建华)	1949年—1956年：中共在高校中的建设 (周良书)
萧克将军访谈录 ——一份尘封 27年的口述历史 (蒋伯英)	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高校党建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李向勇)
从历史发展阶段更替的高度理解和评价 改革开放三十年 (胡承槐)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五四前后的 东西文化论战 (卢 毅)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与苏联对中印边界 问题立场的转变 (冯云飞)	抗战时期延安理论工作者对中国古代 哲学的探讨 (张海燕)
试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中国改革 的缘起 (王海光)	战略转变与新四军东进 (唐培吉)
从结盟到不结盟 ——20世纪 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 调整背景探析 (颜永琦)	《独立评论》的民生思想述评 (黄波胤)
	彭明与五四运动史研究 (张静如)
	一点补充和思考 ——也谈“毛泽东江青结婚中央有无 ‘约法三章’” (金春明)